读史札记

南明使臣卜弥格的中国随从——教徒郑安德肋史事考释

韩　琦

19 世纪之前，由于中西交通的不便，出访欧洲的中国人少之又少。一般以为，明清之际最早到达欧洲的教徒是郑玛诺，他也是第一位中国籍耶稣会士。①之后比较著名的还有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（Philippe Couplet，1623 – 1693）赴欧的沈福宗，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任（Artus de Lionne，1655 – 1713）赴欧的黄嘉略，跟随意大利传教士艾若瑟（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，1662 – 1720）赴欧的樊守义，还有跟随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（Matteo Ripa，1682 – 1745）赴欧，并在其所创圣家书院学习的一些中国教徒（其中较著名的有殷若望与谷耀文）。上述教徒或详或略，都有人作了研究，②但有一位较少被人提及，其真实姓氏也时常被人遗忘，这就是跟随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（Michael Boym，1612 – 1659）出使罗马的郑安德肋。郑安德肋是郑玛诺之后，第二位有名可考的到过欧洲的中国籍耶稣会士。可惜的是，由于史料的缺乏，尚未有人专文论及。本文将根据罗马所藏档案，并结合其他中西文献，对这一人物及其事迹略作考释，并讨论他在《中国图志》（A. Kircher，*China Illustrata*，1667）一书编写中的作用。

一、郑安德肋的事迹

在罗马耶稣会士档案馆，我们发现一封中国籍耶稣会士的信件，全文如下：

小的郑安德肋，字叩禀大尊总师老爷台前：

求进耶稣遗会久日，愚愚之人，未学无量才，小的罪过多端，深如丘山，蒙大尊老爷天恩，矜怜罪人灵魂，收入会中。卜老师有送大尊老爷劄命，小的惠恩无胜，上顶不尽，亲口敬字，永远敢恩，生死负思，心中愧愧，一寸之功无报，托赖大尊老师圣福，小的望暗修虔心，敬伕会师，如小的主人。恳大尊老师祈求吾主耶稣，为其圣教，可多受苦沥血。吾主耶

［收稿日期］2017 – 07 – 21
［作者简介］韩琦（1963 – ），男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，北京 100190；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特聘教授，太原 030006；qihan63@ hotmail. com

① 郑玛诺 1633 年 5 月 25 日生，1651 年 10 月 17 日在罗马入耶稣会圣安德肋初学院，1674 年卒于北京。墓碑上镌有“耶稣会士郑公之墓”：“郑先生讳玛诺，号惟信，广东香山人也。自幼入会真修。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十一日卒于京师，寿三十有八。”参见 Francis A. Rouleau，“The First Chinese Priest of the Society of Jesus”，*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*，Vol. 28（1959），pp. 3 – 50；方豪：《郑玛诺传》，《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》中册，中华书局，1988 年，第 186—199 页。

② 关于黄嘉略，参见许明龙：《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 年。

稣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六年十二月初（廿四日）禀。①

这里的“大尊总师老爷”,② 无疑是指当时的耶稣会总会长 Goswin Nickel（1582－1664）。信中提到“求进耶稣遗会久日”，并说“蒙大尊老爷天恩，矜怜罪人灵魂，收入会中”，说明郑安德肋不仅早有加入耶稣会的誓愿，并且那时已经如愿以偿。信中提到的“卜老师”无疑是耶稣会士神父，而写信时，姓“卜”的老师仅有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一人，而他正好作为南明使节出使欧洲。至于说“卜老师”有“送大尊老爷劄命”，显然是加入耶稣会不久的郑安德肋听从卜弥格，写了这封信送至总会长处，以表达感激之情。他的信用中文撰写，说明他拉丁文水平不够好，需要卜弥格译为拉丁文。

卜弥格 1629 年入耶稣会，1643 年从欧洲出发，1645 年在越南，第二年到海南岛传教，1647 年又到越南，1649 年到澳门，受耶稣会副省会长曾德昭（Alvaro Semedo，1586－1658）之命，1649、1650 年间到广西的南明永历朝廷（1647－1661），协助瞿安德（沙微，Andreas Wolfgang Koffler，1603－1651）传教，受王太后（烈纳）之命赴罗马，携有烈纳和庞天寿给教皇英诺森（Innocent）十世、耶稣会总会长 Goswin Nickel 的信，1650 年 11 月携带两个中国教徒离开肇庆，1651 年元月离开澳门。其中一位教徒（郭若习，或译作柯若瑟）因病未能成行，而另一位从桂林起则一直陪伴卜弥格,③ 出发时 19 岁，是庞天寿下面的一个官员。他们于 1652 年到达威尼斯，后在罗马三年，未能获得教廷重视，教皇英诺森十世也没有接见他们。事情后来有了转机，1655 年 12 月，教皇亚历山大七世（Alexander VII）给王太后和庞天寿写了信。④ 卜弥格得到教皇覆书后，旋即离开罗马，经热那亚，往葡萄牙，1656 年 3 月 30 日，他们和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（François de Rougemont，1624－1676）、柏应理等耶稣会士一起，在里斯本登上了葡萄牙船，经由印度卧亚，在那里停留一年，又经暹罗，试图回到中国。中途颇多周折，并被葡萄牙人拒绝进入澳门，1659 年 8 月，在广西和越南边境去世，这位教徒陪侍在侧，为他安葬。⑤

对于卜弥格这位中国同伴的记载，首见于开意吉（Athanasius Kircher，1602－1680）的 *Oedipus aegyptiacus*（1652－1654），此书中有卜弥格和 Andreas Chin 写的“Elogivm XXVI Sinicum in lavdem Oedipi”，后面署名“厄日多篆，开意吉师，同耶稣会卜弥格叩。”并有拉丁文“Aegyptiaci Oedipi Authori R. P. Athanasio Kircher eiusdem Soc. Iesu Michaël Boym & Andreas Chin Sina，cuius officium est Yeu-Ki，eiusdem Patris ex regna Sinarum in Urbem Comes.”⑥ 这里提到的来自中华帝国的卜弥格的同伴、中国人 Andreas Chin（在罗马），其官衔是“Yeu-Ki”（“游击”?）。后来他的《中国图志》（*China Illustrata*）也有提及。明天启三年（1623），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”出土之后，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。卜弥格到罗马后，开意吉即与之讨论，其成果收入《中国图志》一书，并附有景教碑文。上面提到的 Chin（《中国图志》或作 Sin），学者多有讨

---

①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，Jap. Sin. 186。此信有个别地方文字不通顺，反映郑安德肋中文欠佳。

② 即“最尊敬的总会长神父”，来自拉丁文 Reverendissime Pater Generalis = The most Reverend Father General。承蒙辅仁大学房志荣神父相告，特致谢意。

③ Girard de Rialle，“Une mission chinoise à Venise au XVIIe siècle”，*T' oung Pao*，Vol. 1，No. 2（1890），pp. 99－117，p. 105.

④ 参见方豪：《卜弥格传》，《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》上册，第 308—311 页；黄一农：《南明永历朝廷与天主教》，《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辅仁大学历史学系，2002 年，第 79—118 页。

⑤ 关于卜弥格的研究，参见 Robert Chabrié，*Michel Boym，jésuite polonais et la fin des Ming en Chine*，Paris，1934；爱德华（Edward Kajadanski）：《中国的使臣：卜弥格》，大象出版社，2001 年。

⑥ Athanasius Kircher，*Oedipus Aegyptiacus*，Rome，1652－1654. 此书承蒙杜鼎克（Ad Dudink）博士查阅，特致谢意。参见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，“Michel Boym”，*T' oung Pao*，Vol. 31，No. 1/2（1934），pp. 95－151；爱德华：《中国的使臣：卜弥格》，第 123、228 页。

论，如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引用西方文献加以推测，认为此人姓“沈”，但没有给出中文名字。① 因为 Chin 陪同卜弥格到罗马，参照上述郑安德肋信件，可确证 Chin 即是“郑”，其洗名 Andreas，亦与“安德肋”相应。然而，我们对于郑安德肋的生平并没有更多的资料，目前只知道他出发时 19 岁，是庞天寿下面的一个官员，那么他应该生于 1632 年左右。

马爱德（Edward Malatesta）曾对卜弥格出使经过有详尽的描述,② 并提到教皇在 1655 年 12 月 7 日接见了卜弥格和郑安德肋。他还指出，由于卜弥格的介绍，郑安德肋很容易进入耶稣会，并被接纳为修士（brother）。在热那亚，郑安德肋给总会长 Goswin Nickel 写了一封感谢信，而卜弥格将它从中文译为拉丁文。卜弥格、郑安德肋和卫匡国的人一起，从热那亚出发（1656 年 1 月 11 日），而这封给总会长的信应该是在郑安德肋动身前写的。之后他们很快到了里斯本，卜弥格还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接见，国王还给永历皇帝与庞天寿致书，1656 年 3 月卜弥格一行携书信离开里斯本。

上述行程应该是可以确认的，那么唯一有问题的就是上述中文信的写作时间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文信，落款年份是“吾主耶稣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六年十二月初（廿四日）”,③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理解的是“1656 年 12 月初”，那么郑安德肋应该已经在从欧洲赴中国的路上了，这和马爱德所提到的写于热那亚时间相差有一年之久。从常理上推测，郑安德肋将日期署错一年极不合理。如果真是 1656 年 12 月初，那么廿四日是什么意思呢？24 日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月初。这说明郑安德肋写信，从初稿到定稿，中间可能经历了一段时间。而且如果真是 12 月 24 日，那么作为教徒，可能会写耶稣圣诞前一日，不会只写日期，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传教士的信件都标明有复活节前某日，甚至中国教徒的信完全用中历标注，逢星期日也会加上“主日”两字。④

值得注意的是，现行的公历是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 1582 年颁定的，而每个月的名称则基本保留古罗马的儒略历，因此这套历法的每一个月都有特殊的名称。我们可以看到 18 世纪初教皇给康熙皇帝所写的信件被翻译之后，日期署定为“天主降生以后一千七百零九年马尔西约月初二日”，并非为“天主降生以后一千七百零九年三月初二日”，可见当时的传教士并未将西历月份按照中历习惯按顺序一一对应，那么当时的教徒显然也不可能自作主张将西历的“Decem”对应为十二月。⑤

因此剩下来的唯一可能就是郑安德肋把中历西历混在一起记录。南明永历九年（乙未）的十二月实际上是跨年的，从 1655 年 12 月 28 日至 1656 年 1 月 25 日。那么“吾主耶稣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六年十二月初”就完全有可能了，西历 1656 年 1 月 1 日元旦才是中历的十二月初五。但是“廿四日”仍然不好解释，因为那年的十二月廿四日是 1656 年 1 月 20 日。如果卜弥格与郑安德肋一行是 1656 年 1 月 11 日从热那亚出发的话，日期显然与此不符。我们只有做个大胆的假

---

① 参见上引伯希和文，p. 112。西方文献中，或作 André Hien，或作 Chin、Sin、Cheng，马爱德神父作“陈”，参见 Edward Malatesta，“The Tragedy of Michael Boym”，*Images de la Chine*：*Le contexte occidentale de la Sinologie naissante*，Ricci Institute，1995，pp. 353 – 370。爱德华《中国的使臣：卜弥格》（第 104 页）据卜弥格翻译的西安景教碑文，推测此人姓“陈”或“成”。Ignatius Dunyn-Szpot，（Jap. Sin. 104，sub 1650）称为 Andrea Chien、Antele Chien，感谢杜鼎克（Ad Dudink）博士相告。提到郑安德肋名字的，只有 L.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B. Szczesniak，“M. Boym”，in *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*，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，1976，pp. 20 – 22.

② 1989 年 Chantilly 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，Edward Malatesta，“The Tragedy of Michael Boym”，*Images de la Chine*：*Le contexte occidentale de la Sinologie naissante*，Ricci Institute，1995，pp. 353 – 370.

③ 荣振华提到郑安德肋给总会长的信写于 1656 年 1 月 24 日，参见 Joseph Dehergne，*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en Chine de* 1552 *à* 1800，Roma，p. 265.

④ 吴旻、韩琦：《礼仪之争与中国天主教徒——以福建教徒和颜珰的冲突为例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4 年第 6 期。

⑤ 阴历、公历年尾年初的衔接导致记录相差一年的情形，在 17、18 世纪时有出现，如南怀仁卒于 1688 年 1 月（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），而墓碑上写“康熙二十七年岁次戊辰十二月二十六日”。

设，那就是郑安德肋写信，从初稿到定稿，中间经历了一段时间，即从十二月初至廿四日，而最后完稿在从热那亚赴里斯本的路上，或是在里斯本定稿，之后才经由卜弥格翻译，寄回罗马。

二、郑安德肋在《中国图志》编写中的作用

下面我们将对《中国图志》的作者作一介绍，并讨论此书的撰写背景和郑安德肋在此书撰写中的作用。

开意吉1602年出生于德国Geisa，1618年入耶稣会初修院学习，1628年成为神父，1630年曾请求耶稣会总会长到中国传教，但未获准，1635年到罗马，住在罗马学院，直至1680年去世，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就是他的学生。[①] 他是文艺复兴式的多面手学者，对学术有广泛的兴趣，在音乐理论、地质学、电磁学和埃及象形文字等方面，都有精深的研究，还是博物馆的创建人。罗马是开意吉学术研究的消息来源之地，那些到世界各地传教的耶稣会士，当他们回到罗马时，都为他提供了许多新奇的知识。

开意吉撰写《中国图志》（据序），是因为十多年来自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报告影响了他，在这些人中，有跟他学习过数学的学生卫匡国（俩人有很多通信往来）。另外一位就是卜弥格，还有两位到罗马的神父白乃心（Johann Grueber，1623－1680）和Heinrich Roth（1620－1668），他们受耶稣会的派遣，经陆路到达罗马，当开意吉写作此书时，他们就在身边，并告诉他很多中国的事。由于传教的原因，这些神父所记录下来的有关中国的消息，没有时间整理，于是要求他来发表这些内容。《中国图志》包括了大量卫匡国和卜弥格书中的材料，如《中国新图志》（*Novus Atlas Sinensis*）、《中国植物志》（*Flora Sinensis*）中的内容（如中国的动植物知识）被大量收入书中，还包括耶稣会士从中国经陆路到欧洲的旅行见闻（如关于西藏的不少内容），是17世纪中叶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宝库。

《中国图志》中，第一章讨论的就是唐景教流行中国碑。1623年，景教碑在西安发现不久，岐阳张赓虞把拓片寄到杭州，李之藻在看到之后大喜，说："今而后，中士弗得咎圣教来何暮矣。"[②] 因此在天启五年（1625）写下了《读景教碑书后》，"讵知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"。于是可以说服那些"疑信相参，诧为新说"的人，今后"问官问礼，何隔华夷"。后来阳玛诺（Emmanuel Diaz，1574－1659）撰写了《唐景教碑颂正诠》（1641年序）一书。景教碑的发现，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，但也遭到了部分人的质疑，有人甚至攻击耶稣会士，认为景教碑并不存在，是耶稣会士的骗局、诡计，是蒙骗中国人的谎言。为反驳这些言论，开意吉首先对景教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并得到了卜弥格和郑安德肋的帮助。当时李之藻等人有关景教碑的著作，以及景教碑的拓片，都在罗马学院展出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开意吉希望通过亲眼见过此碑的神父和中国人的准确的、如实的报道，来显示景教传播的真实性，消除后人对此碑的怀疑。在讨论中，他使用了一本中文书中有关景教碑的准确解释，这本书应该指阳玛诺的《唐景教碑颂正诠》。《中国图志》首先用中文的发音，翻译了景教碑文，此项工作由卜弥格完成；第二则是为了更为准确地表达碑文的意涵。在作相关解释时，他参考了利玛窦（金尼阁）、曾德昭的书、卫匡国的笔记以及其他人的著作。

景教碑在西安发现，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十分轰动的大事。耶稣会士闻之也十分兴奋，认为这无疑将有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，意义重大，如同基督的葡萄园被重新耕种。于是耶稣会士

---

① Joscelyn Godwin，*Athanasius Kircher*：*A Renaissance Man and the Quest for Lost Knowledge*，Thames and Hudson，1979.

② 阳玛诺：《唐景教碑颂正诠》序（崇祯辛巳），崇祯甲申武林天主堂梓，见钟鸣旦、杜鼎克、蒙曦编：《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》第二十三册，利氏学社，2009年。

曾德昭到西安，一睹此碑。当曾德昭作为事务代表（procurator），1642 年到达罗马（1644 年 4 月 12 日离开）后，他对开意吉描述了他在西安所见到的一切。① 耶稣会士还给开意吉寄了一本景教碑拓片，当时在罗马学院博物馆展出。

卫匡国在曾德昭之后到达罗马，② 也向开意吉解释了景教碑，《中国新图志》对此碑也有描述。而对景教碑贡献最多的是卜弥格和他的中国随从，开意吉这样写道：

> 最后到达的是卜弥格，他对碑文作了最准确的解释，并改正了他所持有的中文手稿中的全部错误。在我在场时，在他的伙伴、非常精通他的本国语言的中国人郑安德肋（Andre Don Sin）的帮助下，他也对整个景教碑作了一个新的、细致入微的和字面的翻译。他也在下面的‘给读者的序’（此序准确描述了事件的经过和发生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）中，留下了整个事情的描述。经他的同意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包括在这里，作为永恒的和丰富的证明。

西安景教碑发现后，1630 年在福建省、1635 年在江西省，1643 年在泉州城的山上都发现了十字架，传教士对此都有记述。在景教碑发现不久，开意吉就在他的 *Prodromus Coptus*（Rome，1636）中发表了拉丁文译本，后来曾德昭出版了一个意大利译本，③ 这些都根据的是景教碑中文碑文，卜弥格则把拉丁文、中文字面并列出版，保留了中文的顺序，并有开意吉神父叙利亚文碑文的翻译和注解，还附有其他中文资料。当时在耶稣会罗马学院和 Professed House 档案馆有碑文拓片，卜弥格还带回了一本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景教碑的书，此书誊录了景教碑的碑文。④ 卜弥格还写道：

> 叙利亚神父来自哪里和叙利亚碑文的问题，我们现在留给开意吉神父和他勤勉的评注，这样他可以更可靠地做这件事，我们留给他我的同伴——年轻的中国贵族郑安德肋（Don Chin Andrea）——的作品，郑安德肋从杰出的中国学者刊刻的、在整个帝国传播的书中亲手誊写了汉字。我逐字翻译成拉丁文，并标有数码，嵌入正文中。这本书是石头上碑文的准确复制，它和我亲手的证明和其他来自中国的东西一起，被放在我们的博物馆——一种稀有东西的仓库。罗马，1653 年 11 月 4 日。⑤

在这之后，署有“卜弥格神父、中国人 Andreas Don Sin、中国人 Matthaeus（P. Michael Boim. Andreas Don Sin，Sina. Matthaeus Sina.）⑥ ——景教碑的见证人——他们描述了此碑。”这说明郑安德肋在景教碑文的解释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至于中国教徒 Matthaeus，伯希和认为是跟随白乃心从北京到欧洲的中国教徒，他于 1664 年上半年到达罗马。⑦

三、余论

近百年来，通过各国学者的研究，对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有了深入的了解。卜弥格对中国植

---

① 曾德昭在自己的著作中，对景教碑的发现也有详细的描述：1628 年在天主教官员王徵（Philip）的帮助下，几位神父进入了陕西省，由于这位官员的好意和帮助，他们得到了许可，在西安府建造房子和教堂。曾德昭第一个住在那里。

② 卫匡国和卜弥格 1655 年在罗马见面，有一年以上时间同在罗马，承蒙高华士（N. Golvers）博士相告，特致谢意。郑安德肋也应该见过卫匡国。

③ Alvarez Semedo，*Relatione della granda monarchia della Cina*，Rome，1634.

④ Charles D. Van Tuyl tr.，*China Illustrata*，Indian University Press，1987，p. 7。此书很可能是指《熙朝崇正集》，内有景教碑文、李之藻“读景教碑书后”，参见韩琦、吴旻校注：《〈熙朝崇正集〉、〈熙朝定案〉（外三种）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 年。

⑤ 译文据 *China Illustrata*（1987）英文本转译，但改正了英文本的个别错误。

⑥ *China monumentis Illustrata*，Amsterdam，1667，p. 10. 参见 D. E. Mungello，*Curious Land：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*，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，1985，p. 167.

⑦ Paul Pelliot，“Michel Boym”，*T'oung Pao*，Vol. 31，No. 1/2（1934），pp. 112 – 113。

物、医学、药物都很有兴趣，著有《中国地图册》、《中国植物志》（*Flora Sinensis*. 1656）、《中国医药概说》（*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*. 1682）、《医学之钥》（*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*. 1686）等著作，可说是耶稣会士中较早的汉学家。但正如研究《易经》的白晋（Joachim Bouvet，1656－1730）神父身后有举人陆若翰相助，① 写出厚厚《中国宗教论》（*De Sinica Religione*）的颜珰（Charles Maigrot，1652－1730）主教离不开福建相公的帮忙一样，我们也不应忘记，在卜弥格身边有位虔诚的中国教徒，跟随他近十年的时间，从桂林到澳门，从澳门到威尼斯，从威尼斯到罗马，又从罗马到热那亚，最后试图返回中国，直至为他安葬。尽管我们无法得知郑安德肋的拉丁文水平究竟如何，但从他年轻时就追随卜弥格，在欧洲约有四年的时间，对拉丁文应有一定的了解，在这期间，郑安德肋随侍卜弥格，一起生活、工作、旅游，和教会人士接触。卜弥格潜心于对中国著作的翻译、研究和著述，其中无疑会包含郑安德肋的成果，就像开意吉的《中国图志》感谢郑安德肋一样。

卜弥格返回中国的时候，清朝已经建立相对稳固的政权，一部分传教士已经进入清廷服务，而澳门当局也不愿破坏与清政府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，因此这位南明朝廷的使者就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，一直不能回到中国内地复命，最终于 1659 年在中越边境去世。根据有关资料，卜弥格去世时，郑安德肋是当时唯一随侍在侧的人，之后也是郑安德肋将他安葬，可说是善始善终，十分忠诚。郑安德肋之后的情况就不见记载，据说他后来到了越南北部，是否就在那里终老，有无继续履行自己作为修士的职责，我们就无从得知了。

17、18 世纪中国人赴欧洲的历史，学界一直抱有很大兴趣，因为他们不仅具有天主教徒的身份，也是中华文化的代表，他们到欧洲，与欧人交往，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。多年来，我们一直在欧洲的档案馆、图书馆搜寻这些中国人的蛛丝马迹，本文仅就郑安德肋的史事稍作考释，进行了初步研究。但是正如我们所见，郑安德肋以及其他中国教徒在欧洲的活动，和欧洲人的交往，以及宗教生活等各个方面，目前资料并不足以完全厘清，仍值得进一步挖掘，作更深入的研究。

（本文曾在下列会议宣读：2010 年 4 月 19－22 日，台湾辅仁大学主办的“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：东西方对话的初启与开展”；2014 年 9 月 22－23 日，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4 年学术年会暨“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”研讨会。）

① 参见韩琦：《科学与宗教之间：耶稣会士白晋的〈易经〉研究》，陶飞亚、梁元生编：《东亚基督教再诠释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，2004 年，第 420－422 页。